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AMBRIDGE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反对资本主义

Against Capitalism

戴维·施韦卡特 (David Schweickart) /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反对资本主义

Against Capitalism

戴维·施韦卡特 (David Schweickart) / 著

李智 陈志刚 等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目 录

第一章 非比较性辩护	1
第一节 作为贡献的边际产品	4
第二节 作为企业家行为的资本家贡献	11
第三节 作为时间偏好的利息	17
第四节 作为等待回报的利息	25
第五节 作为风险回报的利润	30
第六节 “资本主义因其公正而成为公正的”	35
第二章 比较项	46
第一节 资本主义:自由放任	52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民主”	56
第三章 效率问题	73
第一节 自由放任的效率优势	76
第二节 “经济民主”的效率有多高?	81
第三节 一种比较:X—效率	89
第四节 自由放任的麻烦:失业	93
第五节 更大的麻烦:促销	100
第四章 增长问题	119
第一节 创新、风险和回报:企业家精神	120
第二节 何种增长?	128
第三节 增长该有多快?	138
第四节 不稳定性	149

第五章 自由、平等、民主和自治	169
第一节 自由	173
第二节 平等	180
第三节 民主	190
第四节 有意义的工作	203
第六章 现代自由主义	229
第一节 凯恩斯自由主义的“公平资本主义”	235
第二节 后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	245
第七章 过渡	267
第一节 从发达资本主义而来	268
第二节 从指令性社会主义而来	275
第三节 从新殖民主义的欠发达而来	280
第八章 其他形态的社会主义	298
第一节 指令性社会主义	298
第二节 技术专家统治的市场社会主义	301
第三节 无市场的参与性社会主义	308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	317
第一节 共产主义	319
第二节 悖论与希望	324
译后记	339

第一章

非比较性辩护

资本主义——它可以由人们对它做辩护吗？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得问，人们曾经怎样对它进行过辩护？

当资本主义从即将寿终正寝的封建主义脱胎而生时，自私自利的概念就成为社会瞩目的核心问题。尽管新生制度的拥护者们对于这一“基本人类情感”固有的道德意义有认识上的分歧，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即认为如果适当地将之与自由市场结合起来，将对社会非常有用。^[1]

他们的观点——或者说，完全是整个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但是，麻烦很快也跟着来了。运用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经济范畴，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即使没有垄断（斯密关注的问题）或地主（李嘉图憎恶的人），自由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仍然剥削工人阶级，因为工人是一切价值的创造源泉，但他们却被排斥，无缘获得经济剩余。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件具有不可思议的生产力的东西，而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社会关系，一种权利关系。自由市场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同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在形式上的相同点：一个统治阶级掌握着生产工具，而被统治阶级从事生产活动。

马克思的挑战，特别是在获得了越来越具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之后，使得资本主义陷于防守地位。但马克思学说有一个理论上的弱点，即它的奠基性的价值理论。不久，在欧洲和美洲，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英格兰的杰文斯（Jevons）、瑞士的沃尔拉斯（Walras）、奥地利的门格（Menger）、波姆-巴威克（Bohm-Bawerk）和韦瑟（Wieser）以及美国的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都声称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古典的”分析让位于“边际主义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了。^[2]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胜利并没有能够制止俄国革命，它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大约用了十年的光景，各种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3]但是很快，经济学家们发生了不同的转变。事实一价

值分离被用了进来，经济学家们宣称他们自己（以经济学家的身份）置身于道德问题之外。^[4]因而，对资本主义的辩护问题就留给哲学家、政治家和作为公民的经济学家去做。当然，经济学的结论仍然是重要的：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有效率，或者说，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宣称人固有的利己主义和自由企业制度具有天然联系的人性论论点仍不时被提及，尽管提及频率随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而不断下降。但是另一种观点却逐渐占了上风。当俄国革命蜕变为斯大林主义后，一些人企图极力地重申资本主义和自由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不如说由于法西斯主义和其他冷酷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使得那种因果关系令人难以置信，这种关联被说成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和集权主义之间。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声称“社会主义是通向农奴制之路”^[5]。

现如今情况如何呢？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自从1989年以来，西方媒体一直宣称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告，历史因自由资本主义走到末日而终结。^[6]罗伯特·海伯纳（Robert Heilbroner），一个长期同情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断言：“从它正式开始以后不到75年的时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竞赛就结束了：资本主义赢了”^[7]。

但是，怀疑情绪始终存在。我们打量着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看到了如此多的痛苦，如此多的绝望。难道这真的是人类的命运吗？这真的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的制度吗？如果这是历史的结束，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庆祝它呢？

不仅仅是大众阶层，就是在理论界这也不是件容易理解的事，缺少共识。在经济学家中，新古典主义理论仍占统治地位。它曾经一度为凯恩斯（和大萧条）所中断，但是又被各种混合的凯恩斯经济学重新拼凑起来。^[8]然而，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修正过的新古典主义受到了猛烈抨击。马克思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制度主义者、新李嘉图主义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都否定新古典模型，他们都怀疑边际主义的分析方法。^[9]有很多人，尽管不是全部，对资本主义本身持批评态度。

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混乱不仅动摇了经济学，也动摇了政治哲学。当愤怒的青年人对制度问题的不懈求解浪潮兴起时，两位哈佛哲学家站出来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声称，某些形式的资本主义可以是公正的，他承认某些形式的社会主义也是如此。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罗尔斯自由主义思想的批评者，把道德问题和其他让步再次加给社会主义，他赞成更加保守的自由意志主义的资本主义。^[10]但并非所有的政治哲学家们都对资本主义抱有这样的同情。荒谬的是，在那种时代思潮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在讲英语的地区，左派政治哲学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

且现在依然如此。虽然不是大多数，但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几乎在所有的学科都大有人在。

像这样一项工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罗列，而是为了分析评价各种理论流派。如果我们看一下前面提到的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的那些理论，我们可以把它们划分成两类：比较性理论和非比较性理论。所谓“比较性的”，我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在各种可行的选择中，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功利主义的理论就属于这一类。有很多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辩护理论也属于这一类。非比较性理论声称，资本主义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一种特定的公正标准。那些提出这种理论的人通常还声称，社会主义不能满足这个标准，但这样一种声言不是最根本的。一个非比较性理论采用了“X 满足标准 J”这一形式，相反，一个比较性理论则认为“X 比任何一个可能的 Y 都更好地满足，或者是更有可能满足标准 J”。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有关资本主义的比较性理论更重要些。本书将用更多的篇幅论述它们。但是，某些非比较性的理论也是很重要的，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鉴于目前它们仍然经常被用到，并常常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用到。它们得到了认真的注意并不是因为它们难以被驳倒，而是因为它们常常是一些严重误解的根源，这些误解仍在困扰那些更复杂的比较性理论。

在本章中，我们将要分析几种非比较性理论。它们都维护“权利”说。针对马克思“利润取自未支付的劳动”的指责，他们都认为这种指责是错误的。他们一致认为资本家有权利获得利润。凭什么？很多人说“凭对生产的贡献”。有些人说是“风险”，有一少部分人说是“牺牲”。诺齐克说是“自由”。我们将分析这些说法。

在开始分析之前，先看几个有关这一重要术语的词汇。我们会问这种“资本主义”是什么？让我们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一种具有三个特征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一，绝大多数生产工具归私人所有，可以直接归个人，也可以通过公司这个媒介间接归个人所有。第二，绝大部分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在自由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和服务——“自由市场”意味着价格主要由供给和需求来决定，而没有政府的干预。第三，劳动力是一种商品。也就是说，很大一部分劳动者将他们的劳动能力卖给那些能够为他们提供生产工具、原材料和工作场所的人。

要成为资本主义，一个社会必须具有三方面体制特征：私有财产^[1]、自由市场和雇佣劳动。过去和现在的一些社会都具备了其中的一个或两个，而不是全部三个特征。比如靠农奴劳动而拥有自给自足的庄园财产的封建社会，虽具备私有财产，却不存在自由市场和雇佣劳动。一个小农场主和手工业者

的社会（比如说殖民时期的新英格兰）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尽管它具有私有财产和市场，但它几乎没有雇佣劳动。今天所有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一套较完善的福利制度、大量的国有企业、或者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的执政党的存在都不能判定一个社会是非资本主义的。只要大部分企业是私有的，由雇佣劳动来从事生产，生产的产品基本上是按非管制价格出售，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记住这些特征，现在让我们来考虑如何来（非比较性地）对这种社会进行辩护。

第一节 作为贡献的边际产品

约翰·贝茨·克拉克是“资本主义分配符合按生产贡献进行分配的道德标准”这一观点的早期倡导者，他认为资本主义对每个人生产的价值给予回报，所以它是公正的。克拉克写道：“对‘剥削劳动’的指责充斥着整个社会。”但这种指责是错误的。因为事实证明，“竞争的自然效果是给予每个生产者的财富数量正是他为社会所提供的”^[12]。哈耶克同意这种说法。在哈耶克看来，“最根本的问题是社会是否期望人们应该按照从他们的活动中获得的收益来享受利益，或者说，利益分配是建立在别人对他们的功劳评定的基础上的”。他坚持认为最好的选择就是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13] 诺齐克有不同意见，他引用了“可能由任何原因带来的遗产继承与礼物和慈善”作为反证。但是他同意“按收益进行分配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4]。

但情况是这样吗？这就是我们在本章的这一节和下面三节将要进行研究的内容。我们尤其希望提的问题是，按照“正义就在于人们依他们对组织的实际贡献而得到相应的待遇”^[15]这一标准，财产收入——得自于对生产工具的占有——可以合法化吗？

根据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大多数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资本主义分配的根本原则是“根据他和他拥有的生产工具生产出来的东西进行分配”^[16]。但是这个原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常常不是生产工具的使用者，弗里德曼的学说假定人们可以在数量上精确地区分工具的贡献和工具使用者的贡献。如何能将它们区分开呢？注意，我们不能只是把它们各自的贡献定义为市场回报给它们的那些东西，因为这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问题。我们知道市场的回报。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样的回报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各种贡献。

马克思提出了考虑这个问题的另一思路。在马克思看来，工具的价值只

不过是被转移到了最终产品上，而新价值则是由活劳动创造的。如果一部价值 100 美元的机器在它的使用期内生产了 1 000 件产品，那么它为每件产品的价值贡献了 10 美分。因为机器本身是劳动的产品，10 美分——以及这件产品的价值的所有部分——最终应归因于劳动。

这个答案对于那种非常推崇克拉克学说的新古典传统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克拉克理论的现代版从一个概念开始，加入了几个定义，然后引入了一个数学定理——一个简单的定理，但也许是历史上最具意识形态意义的数学结果。这个基本概念就是生产函数的概念，它是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确定各种相关投入组合的最大产出的一种技术函数。例如，假定玉米是劳动与土地结合而生产出的产品，各种要素的单位是同质的。^[17] 这个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z = P(x, y)$, z 是能够用 x 个劳动者耕作 y 英亩土地（使用特定的技术）而生产出的最大玉米产量。现在问题是：在劳动和土地都是生产玉米所必需的要素这一前提下，各种要素的不同生产贡献是什么？

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边际产品的概念。一种特定的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品被定义为当其他所有各种投入不变时，由于增加最后一个单位的该种投入而产生的增量产品。例如，在给定 10 名工人和 5 英亩土地时，劳动的边际产品就是 10 名工人和 9 名工人在这 5 英亩土地上产出的差额，即 $P(10, 5) - P(9, 5)$ 。同理，在这个例子中，土地的边际产品是 $P(10, 5) - P(10, 4)$ 。

一个初等的标准计算结果是当函数 $P_x(x, y)$ 可微分且 x 和 y 很大， $P(x, y) - P(x-1, y)$ 非常接近于 $P_x(x, y)$ (P 对 x 的不完全导数)， $P(x, y) - P(x, y-1)$ 非常接近 $P_y(x, y)$ (P 对 y 的不完全导数)。^[18] 将这一结果应用于我们的经济模型，我们可以说一种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品与对应于投入的生产函数的不完全导数非常近似（当涉及的数量很大时）。

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明任何事情。我们仅仅是定义了几个术语。但是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个奇妙的数学结果，这个结果是由 18 世纪的大数学家列昂哈德·欧拉 (Leonhard Euler) 首先发现的。如果 $P(x, y)$ 是一个“规范”函数^[19]，那么 $P(x, y) = xP_x(x, y) + yP_y(x, y)$ 。这个式子表示 x 名劳动者在 y 英亩土地上工作的产出就等于两个数量的和，第一个是劳动者的数量乘以劳动的边际产品，第二个数字是土地英亩数乘以土地的边际产品。因此，如果我们把每个工人的贡献定义为劳动的边际产品即 $[P_x(x, y)]$ ，同时把每英亩土地的贡献定义为土地的边际产品 [即 $P_y(x, y)$]，那么，劳动的总贡献 $xP_x(x, y)$ 加上土地的总贡献 $yP_y(x, y)$ ，就正好等于总产量 $P(x, y)$ 。这就使我们根据纯粹的技术资料计算的结果，自然地将总产出分解为劳动的贡献和土地的贡献。这里没有涉及任何私有财产、雇佣劳动或市

场。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没有证明出任何问题。

用一个中性概念“贡献”作为包装，新古典经济学家现在可以问资本主义是否据此来分配它的总产出。答案是毫无疑问的，“并非总是如此”。亚当·斯密对垄断的怀疑再次得到证实：垄断扭曲了分配。然而，在一种“完全竞争”的状态下，相同的商品和服务得到相同的价格，不存在垄断，每个人都努力使自己福利最大化而导致的分配正好是欧拉定理推论出的分配。在一个有 x 个相同技术水平的工人在 y 英亩相同肥力的土地上劳动的社会里，工资水平（每个人）将是 $P_x(x, y)$ ，土地租金（每英亩）将是 $P_y(x, y)$ 。在给定足够的假定条件下，这一点就可以缜密地论证出来。^[20]

尽管这些结果是很重要的，但是证明了什么呢？它能说明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是按照这一分配律进行分配吗？每个人真的是按他所提供的产品来得到收入吗？克拉克对此毫不怀疑：



如果每一种生产要素按照它的（边际产品的）数量获得报酬，那么每个人都得到他自己生产的那部分。如果他劳动，他就得到通过他的劳动所创造的那部分；如果他还提供资本，他就得到他的资本所生产的那部分；如果再进一步，他通过管理劳动和资本提供服务，他就得到归因于这一功能的产出。只有通过这三种方式的任何一种，一个人才能生产出产品。如果他得到了通过三种功能的任何一种而产生的全部产出，那么他就得到了他所创造的全部。^[21]

对克拉克来说，这个结论在道德和政治方面具有高度的重要性：



工人阶级的福利取决于他们所得的多少；但是他们对其他阶级的态度——并由此决定的社会稳定——主要是取决于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得到的数量，无论大小，是否是他们生产的那部分。如果他们创造了一小部分财富并且得到了它的全部，那他们就不会去发动社会革命。但如果情况是他们生产了很大的数量，但是只得到了其中的一部分，那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会成为革命家，所有人都有权利这样做。^[22]

但是，边际主义理论的所有创见都是站不住脚的。它缺乏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贡献”是指它在道德观念而且在日常英语中的含义，克拉克并没有指出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是根据贡献进行分配的。他曾经表示，人们可以不考虑市场机制而决定对总产品的划分，“运作良好”的资本主义根据这种划分进行分配。什么事情都没有完成，他的“贡献”的定义在道德方面是否适宜一直是有争议的。

为了确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考察克拉克的分析。为什么说一个劳动者正好得到了他生产的那部分。新古典主义的答案是：如果他停止工作，总产品的下降正好等于他的工资的价值 [他的工资 $P_r(x, y)$ ，大约是 $P(x, y) - P(x-1, y)$]。但这里确实有个问题：如果两个工人一起停止工作，总产出不会按照他们的工资数量的下降而相应下降。总产品的下降将大于工资部分，因为每个工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得到的工资是最后一个劳动的边际产品——并且新古典理论认为边际生产力是下降的；也就是说，第10个劳动者的边际产品低于第9个的，第9个的低于第8个的，依次类推。这一下降不是因为技术水平的下降，因为每个劳动者都被看做具有相同的技术水平，而是因为收益递减律。它假定在固定数量的土地上， x 个劳动力（当 x 足够大）将会生产出多于 $x-1$ 个劳动力的产出，但是每个劳动的平均产出将会轻微下降。

也许一个附有图例的例子将会表达得更清楚一些（见图1—1）。假设我们有10个劳动者和5英亩土地。在图1—1中，我们绘制了第1个劳动者的边际产品，第2个劳动者的边际产品，第3个劳动者的边际产品，直到第10个劳动者的边际产品。在左边第1个长方形的面积是第1个工人的边际产品——如果他独自工作，这部分就是他在5英亩土地上生产出的东西。第2个长方形的面积是第2个工人的边际产品，即两个工人一起在5英亩土地上共同生产出来的产量与一个人单独生产的产量之间是有差异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合作带来的优势，总产量（两个长方形的面积）大于单个人产量的两倍。当第三个工人加入进来时，这种优势依然起作用，但是，对于第四个人和此后增加的人来说，就会出现收益递减，递减的力量超过合作带来的利益。每一个新工人都会使得总产量增加，但是，增加的量小于前一个工人。记住，这并不是因为技术下降，因为假设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技术水平，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工人来耕种同样固定数量的土地。

因为每一个长方形都代表一个既定的工人为总产出所提供的增量，由10个工人生产出的玉米总产量就是阶梯曲线下方的总面积。按边际主义的概念，劳动的贡献是点状区的面积，即工人的数量乘以最后一个工人的边

际产品，由于边际生产力下降的作用，劳动的贡献低于总产出。根据欧拉定理，这个差额正是土地的贡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一个类似的计算，使劳动保持不变，只改变土地的数量（正如图 1—1 所示），在这种情况下点状区面积，按定义是土地的贡献，将等于上面哪个图中的非点状区面积（反之亦然）。^[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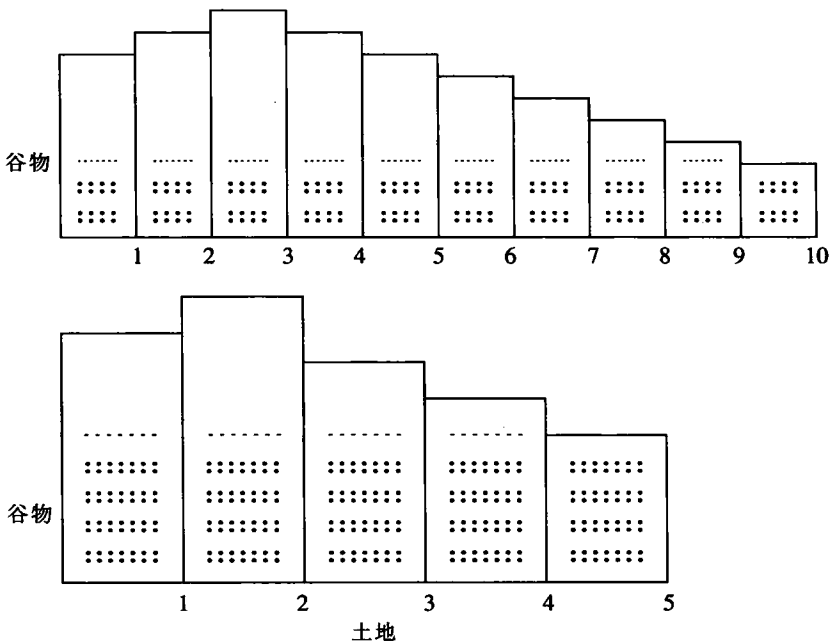


图 1—1 劳动力和土地贡献的边际计算

但是这后一种贡献，即这块土地的贡献究竟是什么？从数学意义上说，它是第五英亩土地的边际产品乘以土地的亩数。但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它不是一种没有任何劳动者而仅凭土地生产出来的玉米产量。没有劳动者，也就不会有任何玉米。也不是由地主自己耕种土地而得到的产量。^[24]它与必须储存起来作为种子或者用于增加肥力的社会产品的那部分也没有任何关系。具体地说，土地的边际产品就是如果减少一亩耕种土地而导致的产量下降的数量。无论如何它并不反映土地所有者方面的任何生产活动。因而，它也不衡量他的生产贡献。

让我们用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重复一下这个观点，以便突出说明新古典主义的术语是如何将重要的问题搞得含混不清的。克拉克声称，一个人可以

通过下面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创造财富：通过劳动、通过提供资本或者通过管理资本和劳动。如果我们把管理资本和劳动看做是一种与生产过程直接有关的管理行为^[25]，那么，劳动和对资本与劳动的管理都是一种完全明显意义上的生产行为；如果劳动者和经理们停止他们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财富的生产同样也会停止下来。经济就会崩溃并停滞。

然而，“提供资本”则是另一件不同的事。在克拉克的完全竞争世界里，技术是给定的，物质资本已经存在。那么“提供资本”就只不过意味着“允许它被使用”。但是给予准许本身并不是一种生产性的活动。^[26]如果劳动者停止劳动，在任何社会，生产都会停止。但是，如果所有者停止准许使用土地，只有当他们对生产工具的权利受到尊重时，生产才会受到影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生产不见得会下降。工人们可以继续做他们以前正在做的事情——生产玉米，还有面包和钢铁或是机器工具以及社会所需要的其他商品。无论所有者在做什么，当他们授权允许他们的资产为人使用时，它不应被称为“生产性活动”。

如果我们试图将“贡献”这个术语应用于别的社会形态，以便确定谁创造了什么，并且是否根据这一创造来分配，那么，新古典主义对“贡献”定义的不恰当性就变得更加明显了。考虑一个封建主的情况。假如他拥有的土地远比他的农奴们有能力耕种的数量多，那么，在“提供土地”的过程中，他不创造任何财富，因为他最后一亩土地的边际产品为零。减掉一亩土地不会减少产量。但是，当他的农奴人口增加时，最后一亩土地的边际产品即他的“贡献”也会随之增加。当所谓“他创造”的财富份额扩大了时，这种曾经通过不公正手段榨取的“贡献”就变得公平，甚至慈善了。

趁热打铁，再推进一步，而非后退：假定一国政府突然将生产工具国有化，那么除了向工人征收一笔使用税外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我们将不会说，政府正在从事生产性活动，或者说税收是对政府的生产性贡献的回报，我们会这样说吗？即使税额并不等于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

因为提供资本不是一种生产行为（至少在事先假定的静态的、完全竞争的模型中不是），因此，来自于这种功能的收入就不像按照人对这个集体的生产性贡献获取收入那么公正。克拉克的正统观点就此崩溃了。

在公正问题上，对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来讲，应该注意到在那些思考过这些事情的人中，几乎没有人接受克拉克的正统分析。但也不得不指出，新古典各流派似乎阻止清晰思考。约翰逊（H. G. Johnson）就是一个代表，他说：



各种要素从它们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获得报酬的积极理论，完全不同于要素所有者是否在道义上有权拥有它们的问题，也不同于如果所有者的偏好不同时，他们的报酬是否将是不同的问题。^[27]

这似乎比克拉克有所改进，但其实并非如此。约翰逊已经与克拉克的道德论拉开了距离，但没有与提供资本就是生产活动的论点划清界限。他的评论完全说明新古典分析倾向于误导正统思想。

注意约翰逊所言非常模糊：“各种要素的收入来自他们的贡献。”如果他用“要素”这个词表示土地、劳动和资本，那么他说的话明显是错的。土地、劳动和资本并不能得到收入；是要素的所有者得到它们。如果他用“要素”一词指所有者，那么他就是在宣称，这些所有者做出了一种贡献，这说明他们正在从事生产性活动——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种观点还暗示危险的道德问题，要么所有者做了贡献，从而所有者的要求权是合法的；要么道德标准本身是恰当的，收入应与贡献一致。换句话说，新古典主义思想“各种要素的收入来自生产贡献”转移了人们对更重要的问题观察的注意力，即提供资本这种特殊“活动”据称是建立了资本家的贡献的论点本身是有问题的。

尽管有重复之嫌，我们还是来总结一下我们与新古典理论不一致的地方。新古典主义评价资本家贡献问题的根本缺陷，既不是因为它建立在一个有问题的道德标准基础上，也不是因为它假定现存财产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这些问题以及内容的标准性质，从而将它们留给哲学家和政治家去解决。缺陷就在于提供劳动是生产活动这一假定，这个概念在新古典主义者们的运用过程中实质上具有了真实性。以这样的方式来定义生产要素的贡献时把产品自然分解成这些要素的贡献，什么似乎更自然呢？称为要素贡献还是称为所有者贡献，特别当它恰好等于自由市场回报给每个所有者的贡献时。如果每个所有者都对最终产品有所贡献，什么东西把他作为从事生产活动看上去更自然些呢？什么可能是更自然的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还有一种手段被使用了进来。因为在一个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静态的、完全竞争的新古典世界里，所有者没有从事任何可以成为“生产活动”的事情，因而，他不能求助于用来判定建立在生产贡献基础上的报酬的道德标准。即使所有者对他的财产有完全有效的要求权，即使这个标准是完全合理的，他也不能断言：他根据这个标准从他的财产中获得收入。

我们必须得出的结论是，关于“贡献”的边际产品定义不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分配与贡献的道德标准是一致的。它提供了一个标准，以便评判“产出的 $x\%$ 是劳动的贡献； $y\%$ 是土地的贡献”等论断的正确性，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切断了—种要素所有者的贡献与要素本身的法律关系以外的任何关系。在一个给定技术水平的、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以资本家身份出现的资本家，不冒任何风险，不革新，不牺牲，不从事任何可以称之为生产活动的事情。对个别活动的抽象允许一个人用一种精确的数学方式来定义—种要素的贡献，也消除了所考虑的为—种要素的要求权找出的任何原因，贡献是在任何与道德有关的意义上对所有者的生产活动—种衡量。如果—个人要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他必须要么对“资本家的贡献”重新进行定义，要么放弃用作辩护标准的道德标准。然而这个优美的数学意义上的边际产品理论作为—种道德理论的基础也许是，而且确实是失败了。

第二节 作为企业家行为的资本家贡献

边际主义者的“贡献”定义不能与道德意义上的使用保持一致，原因是它完全脱离了财产所有者的全部特有的活动。熊彼特在对我们一直在考察的新古典模型进行—次著名的批评时，提出—种定义：



要抓住的最重要—点是我们在面对资本主义时就是在面对—个变革过程。也许看似奇怪的是任何人都没有看出这么明显的—个事实，而且是很久以前马克思就强调过的—个事实。但是催生了有关现代资本主义作用问题的大量论述的那个不完整分析却始终忽略了它……启动资本主义引擎并保持它处于运动状态中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于新的消费品、新的市场、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新的工业组织形式。^[28]

如果确如熊彼特和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它具有的动力，那么，使用这种动力来决定资本家和劳动者的相应贡献以便对不同时间点的社会加以比较，似乎是更合适的，而不是在—个特定时间给定的技术水平下，去观察设定的资本和劳动的变化（就像上文中边际主义的分析所做的那样）。至于在—段时间内的产出增加，可以将其归因于资本家的活动，也许我们可以把他的贡献定义为那个增加。—个简单的模型可以阐明—思想。

假定资本家—地主雇用 10 个人种植玉米。这 10 个人按通常的方法能够生产，比如说 1 500 蒲式耳玉米。但是假定我们的资本家—地主重新组织一下生产，有所革新，结果使他的工人现在可以生产 2 000 蒲式耳。这多出的 500 蒲式耳就是他的贡献。

这个定义似乎带来了希望，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难题。这个定义将不适用于证明资本家的收入是正当的，因为他在年终时将获得多于 500 蒲式耳玉米即多于他的贡献的收入。除非在进行革新前他将所有的 1 500 蒲式耳全部付给了他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是个资本家了），他将收到 500 蒲式耳加上他通常得到的那部分利润。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考虑一个新加入的资本家来避免这个难题。当我们观察一个典型的资本家时，发现他的一部分收入来自于他对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但是这个发现也许是误导性的。似乎仅凭所有权而获得的那部分收入也许实际上是对以前活动的回报。为了考察这一案例，让我们修改一下我们的模型。假定土地是丰裕的而且是免费的，一个人单独进行工作，他每年可以生产 150 蒲式耳玉米。假设此时出现了一个企业家，他吃得很少，想得很多，他积累了 1 500 蒲式耳玉米，并提出了一个新创意：一种新型耕种方式的革新观念。他利用他的“资本”，雇用了 10 个工人，每个工人的工资定为 150 蒲式耳，将他们集中在一起进行工作，先犁地，然后充分利用土地。假定结果是收获了 2 000 蒲式耳。当然我们可以将这 500 蒲式耳说成是资本家的贡献。总之，如果没有他的话，工人们只能生产出 1 500 蒲式耳。

这种关于“贡献”的概念看上去既不模糊而且在道德意义上也很直率。资本家的贡献被很好地加以定义并与一种特定的生产活动即革新联系起来。^[29]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模式运用于第二年，又出现了新的复杂问题。刚刚描述过的过程现在可以重复自己，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对于 2 000 蒲式耳的收成，不需要出现任何新的革新。对犁地和重新组织生产格局的规划现在已经存在了。假定工人们第二年像前一年一样工作，先犁地，再用它们进行种植，就得到了另一个 2 000 蒲式耳的收成。我们现在要问，是谁贡献了这 2 000 蒲式耳？在一种意义上，资本家贡献了 500 蒲式耳，因为从最初的起点开始衡量，这个增加是 500 蒲式耳，而且是源于他的创新。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他没有贡献任何东西，因为我们把起点定为前一年，因此不存在任何增长，从而也就没有资本家的任何贡献。资本家今年没有引入任何新技术。当我们把它定义为可以归因于他的企业管理活动引起的产出增加时，我们指的是哪种意义上的资本家贡献呢？

当然不会是第二种意义上的，因为它依赖于一个完全人为确定的时间段。

衡量前一年的增长在玉米案例中是很自然的，它有年度生产周期，但是在钢铁或面包生产案例中，它似乎就没有这么自然了。我们也可以定为两年或10年、6个月或6周。那里不再有“自然的”时间间隔，除非这个贡献不再是资本家的贡献而变成了他的工人的贡献。^[30]

因此我们不能确定一个时间限。但这意味着我们有了一个贡献概念，它使其中某些贡献必须是永久性的，而另一些贡献则仅仅是短期性的。资本家和他的劳动者们在第一年都付出了脑力和体力，各方都做出了一种“贡献”。然而，根据我们选择的定义，资本家的贡献能继续进入下一年，再下一年。如果他再革新一次，按贡献标准他将以其的新革新又带来了一个产出增量，但是他最初的贡献却并不终止。与此相反，劳动者的贡献却随着劳动的终止而终止。劳动者在每一年都必须更新贡献。

读者们也许对论证所采取的方法感到无所适从。我的模型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个极度简单化的概括；没有竞争，没有风险，没有技术淘汰。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永久贡献”的概念来辩护资本主义吗？我们的简单化还没有把我们带入歧途吗？

我们可以通过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可以说是从反面入手观察这个问题，我们能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要想根据贡献的标准来辩护资本主义，首先人们需要有一个关于“贡献”的定义，然后，阐明它的道德意义，最后还要论证资本主义事实上是依据这个定义来分配报酬的。我们已经将“贡献”定义为在一段时间内产生的增长，那么，运用一个简单化的模型，即我们已经揭示的“永久贡献”，一个相当令人困扰的概念。让我们撇开我们的简单模型稍加思考，考虑一下当代资本主义现实。要想搞清我们是否需要这个“永久贡献”概念，我们必须问一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否真的存在“永久报酬”？

当然存在。在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有一些机构负责给个人发放与他们的现期活动无关的报酬。一笔货币积累，尽管是过去所得，当个人认为合适时，它也许会被用来投资。个人也许将它投入储蓄账户，或者是购买政府债券或公司债券。如果他这样做了，只要不关闭账户，不卖出债券，或机构不破产（即不确定），他就可以获得利息。如果他转为购买股票，他可以获得年度分红，当然也是不确定的。这样的收入完全脱离了最初的、原始积累可以溯源的革新（如果曾经有过的话）。的确，从逻辑必然性讲，报酬不是永恒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上，在这里，企业可能会失败，银行也会破产，尽管正如我们所知，目前存款通常是由纳税人给保险的。但问题是这种报酬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与投资者方面的任何生产活动的持续